王树国曾说，自己的家国情怀，很大程度上源自父母。他的父母都是抗战老党员，尽管早已去世，但有些东西是渗入到骨血里的——

家国大义 薪火相传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 杨可新 摄影报道

1963年11月，王福芹、张润波与二子治国（左一）、三子树国在一起

扫码看视频

春夏之交，在海兴县老干部局院内，一位满头华发的老人，披着一身阳光，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。他叫王治国，71岁，王树国的二哥。

王治国说，平生他有两大骄傲，一是父母，二是三弟王树国。作为福耀科技大学的校长，当代教育家王树国被人们亲切地誉为“宝藏校长”。

“三弟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和他自己的努力分不开，但也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。尤其是三弟的家国情怀，更是和父母直接有关。”王治国说。

王治国

王树国

不惧怕困难，源自父亲王福芹

曾有人问王树国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，他想了想说是不惧怕困难，并说这一点主要源自父亲王福芹：“父亲14岁参加革命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。他经历过很多坎坷，但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信仰。就我自己来说，不管多么难多么苦，就只有一个信念，加把油、往前走，我从来都认为，希望就在眼前。”

海兴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，王福芹出生在献县临河乡西镇村，3岁就没了娘。他和父亲及哥哥艰苦度日，困境中懂得了感恩，养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。

1940年8月，年仅14岁的王福芹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献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安局的一名交通员，在献县、泊头、南皮一带参加了反“扫荡”、破坏敌人交通设施、袭扰鬼子据点、策反汉奸队等一系列抗日活动。

别看年纪小，王福芹却聪明机智，胆大心细。1942年初秋，在一次锄奸活动中，他以分烟为名，巧妙甩掉汉奸头子带来的3个随从，又当机立断，关上大门，来了个瓮中捉鳖，为锄奸行动立下首功。

革命年代，他与一起参加抗日工作的张润波相识相恋，组成了家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福芹来到盐山工作，后担任盐山县赵毛陶公社书记。他们也举家搬来此地。王治国和王树国都出生在这期间。

1965年海兴建县，王福芹调任海兴县辛集公社书记。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他顶着各方压力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使辛集有了自己的机窑厂，带领大家进行农业生产设施建设，让当地老百姓受益几十年。

“你打算怎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？”

王治国兄弟4人，他行二，比王树国大5岁。那时，父母要外出工作，没有时间照顾三四岁的王树国，就让正上小学的王治国领着他去上学。

王树国在教室里不哭不闹，听得认认真真。老师偶然提问，他都能回答正确。旁听了3年，王树国正式上学。他的成绩在学校一直数一数二。

1973年，王树国高中毕业。那时，他的两个哥哥已先后参军。在母亲的鼓励下，王树国踏上了下乡之路。临行时，母亲正生病。她告诉儿子：“入党以后再回来见我。”

王树国下乡的地方是海兴县孔庄子农场。一次挖猪圈，他把手弄伤了，当时什么也没说，忍痛继续干活儿。后来手部感染，被发现后送医，大夫说，再不治就要截肢了。所幸治疗及时，手保住了。

农场的日子非常艰苦，饶是如此，王树国也从未间断学习。“那时，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作文给之前的班主任审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只是潜意识里有一个声音在不断鞭策自己：不要浪费光阴，要用有限的时间多学习、多读书，不辜负母亲的期望。”王树国说。

从农场到油田，临行前，17岁的王树国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：“入党以后，我就回来看您。”

那时，正是王福芹一家的至暗时刻：王福芹被划为右派，家人也跟着受牵连……无论何时，王福芹和妻子都坚信党，坚信终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受父母影响，王树国拼命工作。他说：“我觉得如果不是党员，都无颜回去见父母。”

1年零3个月后，王树国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母亲这个好消息。“母亲特别开心，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，你打算怎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？”

1977年，王树国走进高考考场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工大录取，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。

家国情怀，来自父母言传身教

平反后，王福芹先后担任海兴县副县长、县政协主席。离休后，每年县领导来慰问，他都为海兴的发展建言献策。而对于组织上送来的慰问金、慰问品，他一概不留，都交到县老干部局，说：“送给那些比我困难的同志吧！这些钱和东西就算一名老党员的心意吧！”

在王治国眼里，父亲正直无私，从不搞特殊。记忆最深的两件事都和车有关。一是王治国在小山乡工作时，一次下班途中，正赶上司机开车带父亲回县城，看见他后停下车，想顺路带他一起走。父亲却阻止说：“公车哪能私用？”最终也没带他。二是父亲年老住院，出院时，身体还很虚弱，走不了路，他想找辆车接父亲回家。父亲说：“都离休了，别麻烦公家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找同事帮忙，总行吧！”父亲说：“你同事的车不也是公家的吗？我不坐！”最终，他自己花钱租了辆面包车，才把父亲接回家。

王治国退休前在海兴县公安局工作。一次，他和父亲谈起抓捕犯罪嫌疑人时，自己在沟里趴了整整一夜。父亲说：“这算什么？当年我打鬼子，在沟里一趴就是5天！”

走进大学、出国深造、成为高校校长、当选全国人大代表……王树国越来越忙。渐渐老去的父母也偶发感慨：“你怎么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？不过，能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就好！”

“父母从来没和我说过，将来你要多挣钱、过好日子。父母总是问我，有什么收获，能为国家做什么事情。”王树国说。

王治国说，小时候，他从没穿过新衣服。一次，自己忍不住抱怨。母亲说：“你看我穿的什么？”一句话，让他再也没了怨言。

磕破了的碗舍不得扔，几次搬家都捎着；孩子们穿的衣服上，补丁摞补丁；母亲经常帮助别人，可搬家需要帮手时，却不愿意麻烦别人，自己带着孩子们用小推车一车车地拉……

他们教给孩子的是家国大义，信念的火种；是遇到困难，挺起腰杆，绝不低头；是不去讲究吃什么穿什么，也不去计较个人荣辱得失，而是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专注用心。比如，王树国心心念念的国家、教育、科研。

“父母的言传身教早已渗透到我的骨血里，伴随我一生。”在西安交大时，王树国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自己的父母。他说，父母虽然不在了，留在他印象里最深刻的话仍然是“工作做得怎么样、有什么新的业绩”。

这句话，也许就是王树国一直以来不竭的动力。

“国立一中”连续报道

98岁国立一中老校友戴境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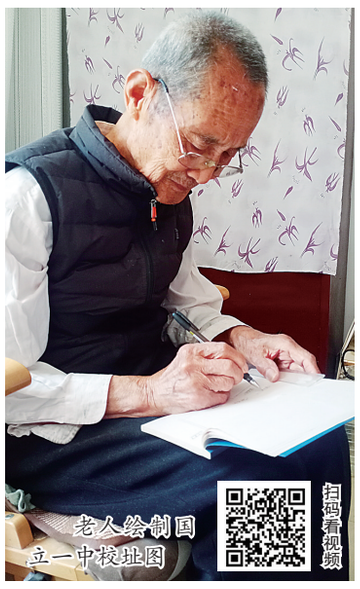
流亡南下考入国立一中 投笔从戎走上抗日前线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

“军马站村有一位98岁的老人，在国立一中读过书！”

5月2日，得知这一信息后，我们马上赶到沧县李天木镇军马站村，通过老人的侄子戴志军，找到了戴境章。

老人戴着一副眼镜，面容清癯，腰身挺直，目光和善。他耳不聋、眼不花，记忆力好，人淡如菊，言谈中难掩知识分子的风骨。说起在国立一中读书的故事，老人好像回到了曾经的岁月，深邃的眸子里，仿佛投射着历史的影子。


老人绘制国立一中校址图

扫码看视频

逃亡南下考上国立一中

戴境章原名戴其蓉。境章这名字，是他在当时的沧县县立牛市街小学上学时，校长姜苹给他取的。姜先生说：“其蓉像个女孩儿名，叫境章吧！”境章的寓意是什么？先生当时没有多说。他用了一生的长度，才咂摸出这个名字的深意。

1942年的中国，狼烟遍地，民不聊生。在日本人的占领下，沧县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。戴境章的堂兄戴其萼，是早期共产党员。戴其萼和戴家三兄弟投笔从戎，先后奔赴抗日战场。那一年，戴境章16岁，在沧县师范学校附中读书。他再也坐不住了，怀着“再也不当亡国奴”的想法，他悄悄跑出了学校，逃离了日本兵把守下的县城，来不及回家告别母亲，就扒上了南下的火车，一路颠沛流离，辗转来到了河南洛阳。

当时，河北省流亡政府驻在洛阳。为收容河北省沦陷区的青年学生，省教育厅专门成立了青年招待所。1942年秋，国立一中来洛阳招插班生，戴境章幸运地考上了。他和同时被录取的3名同学翻山越岭，徒步300多公里，来到大山深处的淅川，一路打听找到了心向往之的国立一中。

到了学校，一路的辛苦和疲惫一扫而光。“学校在牛尾山下，淅水河畔，环境很美。这里都是河北的师生，感觉特别亲切。”戴境章说，眼眸中闪烁着欣喜振奋的光，仿佛回到了81年前。

不敷衍、强体魄、学本领

戴境章被分到国立一中初中部23班。班主任孙老师博学仁厚，对学生很好。师生们大多远离故乡和亲人，相同的境遇，让他们亲如家人。放假时，孙老师会让学生去家里玩儿。

戴境章在这里感受最强烈的有两点，一是学校注重学生体质训练，二是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很高。

每天早晨6点，是学校的早操时间。高中部以军训标准训练，初中部按童子军标准训练，要求都很严格。学生们吃不好，住宿条件也很差，学习的劲头却很足。回首往事，戴境章念念不忘校园优美的自然环境：“学校外边就是淅水。夏天，我们去那游泳。水里的鱼儿特别淘气，会咬我们的脚趾。”老人说着，双脚轻轻摆动，好像他又踏进了淅水，那80年前的鱼儿又咬住了他的脚趾。

采访中，老人不止一次地提到国立一中老师们教学水平高，而且各有特色。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老师，每次上课，他都用吟唱的方式教学，课堂气氛活跃又轻松。戴境章眼界大开，学习的兴趣更浓了。

在我们的恳请下，老人画起了国立一中校址图。98岁了，老人握笔的手重若千斤，一笔一画却写得工工整整。写完，再看，核实无误后，才递到我们手中。

老人说，国立一中的校训是不敷衍、不作弊，这影响了他一生。

知识分子风骨

虽身处乡村，戴境章身上却有知识分子的风骨。他不卑不亢、谦谦有礼、多才多艺，98岁了，还在侍弄花草。在报纸上看到国立一中的报道后，老人迫不及待地让家人联系记者，并坚持站在门口等候。

采访中，一起前来的国立一中历史研究者李永翔，讲了他知道的一件事：一天，国立一中涌进一群乡民，吵吵着说学生们偷掰了玉米，向校方讨说法。正在师生们不知如何应对时，校长杨玉如走上来说：“孩子们远离家乡，流亡到河南求学。我们没有管教好孩子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是学校的责任，是校长的责任。”说着，他撩起长衫，双膝跪地，当场致歉。

戴境章说，男生们还真干过摘红薯秧子、掰玉米的事情。这件事在学生中影响很大，他们从此再也没偷掰过玉米。杨校长的形象，也深深刻在他的心中。之后，国立一中敞开校门，招收当地孩子入学，还派师生组成宣传队，到淅川各地进行抗日宣传。

“学校常办晚会，节目都是同学们自编自演的。”老人说着，唱起了歌曲《朱大嫂送鸡蛋》。一曲唱罢，老人说：“这是一首宣传抗战的歌曲。每次演唱时，演员在台上唱，我们在台下和，大家群情激昂，都盼着早日学好本领、抗击日寇、报效国家。

1944年底，戴境章参加了青年远征军，来到抗战前线。这一年，他18岁，刚考上高中不久。很快，抗战烽火蔓延到淅川，国立一中不得不西迁至陕西城固。“那时，很多男生参军，女生去了剧团。跟随学校西迁的，只有部分学生。”戴境章说。

为母亲再洒一把泪

1948年10月，戴境章所在部队在沈阳投诚。从此，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跟随部队南征北战，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。

直到这时，他才有机会给老家写信。离开家乡时，他16岁，如今已20岁出头。父亲去世早，离开家乡时，他匆匆南下，顾不上和母亲告别。几年时光，音信隔断，恍如隔世。这些年他迫切想知道母亲的消息。

兄弟回信说：“母亲安好，勿念。”他更沉不住气了。当即找首长，表示要回乡看望老母。恰好当时部队可以转业，他立即申请转业回家乡工作。首长让他深思熟虑，他说：“这些年没有床前尽孝，为了老母亲，值！”

当他风尘仆仆、满怀期待地回来，推开家门，却空无一人——母亲已经去世了。那种悲痛和跌落至冰点的感觉，让他痛彻心肺，至今想来，都忍不住痛哭失声。

那是整个采访中他唯一的一次哭泣。战乱逃亡、颠沛流离，没有让他掉泪。98岁，几乎看淡一切的他，把眼泪留给了母亲。

1952年，他以教师的身份，出现在军马站小学的校园中。1956年，他被调到风化店中学，先当教师、后做校长，教书育人36年，托举着一代代学子、教师的成长，活成了小时候牛市街小学姜苹校长为他取名时期许的样子。

运河边的狮子山园

昨天，记者在市区行走运河时发现，清风楼北面三四百米处，建起一座狮子山园，为运河市区段再添一景。

从清风楼沿堤顶路向北走三四百米，有一座古运河石狮艺术馆。艺术馆南，就是狮子山园。这是一处以石狮文化为主题的街边园林，沿着“狮子滚绣球”的甬道而行，杨树林中，一座高大威武的石狮，面对运河，昂首阔步。石狮艺术馆馆长董义介绍，这座石狮高3米，重约13吨左右，由石狮艺术馆收藏。石狮用材为曲阳一级汉白玉，工艺精湛，采用古法剁斧工雕刻。园内放置了大量赏石，安置了阳篷桌椅。行人路过，可进园观赏石狮，也可打卡小憩，成为运河畔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杨金丽

杨金丽 摄

沧州武术中的“龙”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

今年是龙年，沧州武术中是否有龙的元素？日前，记者来到青县武术会馆，听著名武术家、盘古武校校长刘连俊聊聊沧州武术中有哪些龙元素。

“劈挂拳是中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，其中就有一趟拳，名为青龙拳。劈挂拳以劈为主，讲究猛劈硬砸；青龙拳以挂为主，讲究掏打撩阴。一劈一挂，合起来才是劈挂拳。”刘连俊说，以劈挂著称于世的沧州武术家很多。沧州武术有开放、包容的传统，各门派之间经常互相交流、互学武艺、取长补短。很多武术家都练习过劈挂拳和青龙拳。比如，以燕青拳闻名的著名武术家祁鸣松，就曾以青龙拳打过比赛。刘连俊的青龙拳，是和武汉体院武术系主任张克俭学习的。

武术中还有一套青龙戟，是自古传下来的武术器械套路。在陈列的十八般冷兵器前，刘连俊介绍，单面的戟叫青龙戟，双面的戟叫方天画戟。三国时期，吕布使的兵刃就是方天画戟。武术中，青龙戟和方天画戟练起来基本一致，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另外一套与龙有关的武术器械是青龙偃月刀，这是三国时期关羽使用的武器。在武术界，关羽的地位很重要，被誉为“武圣”，其忠义精神，也正是武林中人向往追求的侠义精神。

武术中的“龙”元素比比皆是

扫码看视频

仔细端详陈列的十八般兵器，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：刀、枪、戟、斧、钺、锏、铲、矛……很多器械的“吞口”都是龙形的。“吞口”是武术器械上连接兵刃与柄手的铁质或铜质构件，下面缀以红缨，增强器械美观。刘连俊说，“龙吞口”是自古传下来的，别看“吞口”不大，却增加了武术器械的质感，更好地传达出武术的精神。

其实，武术中的龙元素还有很多：练功服上，多绘有金丝银线的龙形纹饰；刀身剑刃上，也多刻有龙纹；很多武术套路的招式上，也有以龙命名的动作，比如四象功法中的“青龙白虎”、八极拳金刚八式中的“降龙伏虎”……刘连俊说，龙是腾云驾雾的祥瑞，具有积极进取、勇于拼搏、不畏困难、敢为人先的精神，和武术的精神是相通的。这也是沧州武术中蕴含龙元素较多的原因。